

民族文化传播研究(2015)

MINZU WENHUA CHUANBO YANJIU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编

民族文化传播研究(2015)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文化传播研究(2015)/中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216-08743-8

I. 民… II. 中… III. 民族文化—传播媒介—研究—中国 IV. 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7208 号

出品人:姚德海

责任部门:文史古籍分社

责任编辑:皮明

封面设计:刘舒扬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谢清

法律顾问:王在刚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407 千字

版次: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7-216-08743-8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张:23.5

插页:2

印次: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陈峻俊

当我们沉浸在信息社会所带来的无穷便利时,人们开始惊讶于少数民族文化也开始被裹挟进信息世界的浪潮中。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作为思想先锋的知识分子,又一次陷入苦闷与彷徨: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消费畸形、对外传播受限、对内传播明显弱势和民族文化符号机械复制、地区发展不平衡、资金人才缺乏等重重困境。对于任何一位企图探究这些问题的学者来说,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是如此明显,面临民族文化生态转型,各学科的学者都在不遗余力贡献力量。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背景。

民族文化虽然是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但我们的这本书仍有明显的学科倾向——传播学。文化与传播是相互作用和交叠的,少数民族文化也不例外。我们试图打破过去民族学的学科思维模式,熔铸一些新的东西——综合各种传播学的优秀观点和有用的研究策略,从新的角度阐释民族文化。我们希望在这本小书里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能够提供一个更宽泛的说明,它应该不拘泥于我们过去的研究,这项工作的目的正在于勾画出文化传播研究与社会科学实践的融会贯通,以及新媒体影响下传统与完美的完美结合。

从这一意义上看,了解民族文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明确民族文化传播的发展方向,探讨民族文化传播的特点与规律,交流民族文化传播与传承方面的成功经验,以便进一步提升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与传承能力,改善和优化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播环境就成为一项迫切而又十分重要的任务。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2015年,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中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发起组织了《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编撰工作,希望借助中心成员过往的研究相互交流信息,总结经验,探讨问题,共同去实现大家所确立的奋斗目标。在书中,我们的研究分为四部分:民族文化遗产与传播、民族地区新闻传播、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民族文化的海外传播。本书研

究所涉及的区域主要包括中国各民族自治区,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省级行政区,由于学校地理位置的限制,我们的研究优势地在于中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聚集区域。我们的研究可能还略显粗略,但每位老师对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热情却是真诚和鼓舞人心的,我们的成员中既有高卫华教授这样的大家,也有中年研究砥柱,更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才俊,每位老师都认真对待、毫不保留地贡献自己的研究成果!民族文化传播已成为一种使命!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的书名叫《民族文化传播研究(2015)》,我们希望2015只是一个时间节点,这一年民族文化传播学者济济一堂,在南湖之畔回首过去,总结成果,发现问题与不足,也是这一年,我们开启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媒体融合之维,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民族文化传播研究(2015)》只是一个起点,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学者有了自己的研究平台,借助新媒体蓬勃发展和大家共同努力,我们期望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研究走向更大的成功。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教授)

目 录

◎ 第一部分 民族文化遗产与传播 ◎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三个传播断层反思	高卫华(3)
我国传统文化载体的现代传播价值	
——以武当太极的文化阐释为例	高卫华(15)
民族文化品牌形象传播及其问题对策探讨	
——以武当太极文化传播为个案	高卫华(21)
论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现状及其发展	高卫华(26)
“少林”文化形象整合传播模式解读	高卫华(34)
巴东纤夫文化品牌的认知误区与健康传播	祝 翔(41)
鄂西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传承人的人生状况考察	黄迎新(50)
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环节	
——以湖北民族地区的世界遗产申报为例	黄迎新(59)
湖北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现状与对策	黄迎新(72)
长江三峡旅游区的品牌传播	徐 红 马 艳(81)
清江土苗民俗风情旅游区的品牌传播	徐 红 王丹丹(94)
论土家族婚丧礼民俗的仪式传播	徐 红 赵 禄(109)
镜像与自我:商业大片时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形象	
解读	高卫华 梁春晴(118)

◎ 第二部分 民族地区新闻传播 ◎

大众传媒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符号化结构功能

- 以《恩施日报》报道“恩施女儿会”为例 高卫华 杨 兰(131)
- 传媒文化责任与民族文化传播关系探析 高卫华(143)
- 民族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的几点思考 陈峻俊(148)
- 试论少数民族地区新闻报道的民族特色 陈峻俊(154)
- 民族地区传媒受众认知特点与思考 陈峻俊 李亚玲(164)
- 报纸新闻传播语言的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 高卫华(171)
- 论传统年节习俗报道与民族文化遗产的关系 高卫华(177)
- 现代传媒与传统:电视与传统文化的社会互动研究
- 基于女书村落的民族志调查 陈峻俊 何莲翠(182)

◎ 第三部分 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 ◎

- 祭孔大典仪式的网络传播意义解读 高卫华 孟萌萌(197)
- 数字化时代中国女书的保护与传承创新 祝 翔(205)
- 数字化技术在日本民族文化遗产中的运用及启迪 徐 红 郭姣姣(216)
- 网络典型报道传播民族传统美德的文化建设功能
- 以湖北网络典型报道为个案 高卫华 陶喜红(237)
- 新媒介背景下民族地区手机传播功能研究
- 以湖北恩施市与鹤峰县实地调研为个案
- 高卫华 杨 兰 陈 晨(243)
- 发展传播学视角下鄂西民族地区互联网策略研究
- 基于鄂西巴东县、鄂中沙阳县比较调查 陈峻俊(258)
- 论网络媒介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 陈峻俊 邹慧霞(266)
- 浅析网络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新特点 陈峻俊(272)
- 浅议民族地区旅游品牌的网络推广 陈峻俊 杨渝莹 李静蓉(278)
- 网络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与特点 陈峻俊 李远兰(284)

◎ 第四部分 民族文化的海外传播 ◎

新媒介语境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世界传播策略	高卫华(293)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具象化与概念化传播效果分析	
——以跨国公司的“问题”广告传播为例	高卫华(302)
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文化路径转型	陶喜红 李春燕(307)
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现实问题与改进策略	陶喜红 李婷婷(317)
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海外传播形态	李锦云(326)
论 NHK 纪录片的中国表征与价值取向	徐晓波 田 雪 孙儒为(334)
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PP)的“中国元素”	徐晓波(348)
近代日本作为“中间人”对中国广告近代化的影响初探	汪前军(357)
作者简介	(367)
后记	(369)

第一部分

民族文化遗产与传播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三个传播断层反思^{*}

高卫华

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由学者发出“打倒孔家店”的断言,十年文化革命来自政治层面隐喻式的对“孔老二”的贬斥,体制转型期我国公众对西方信息理想化误读带来的对传统文化的疏离,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传播的结构性断裂。西方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这三个传播断层对传统文化的逐次剥离,导致公众文化价值取向的困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需要对此进行理性反思。

关键词:民族文化 传播 三个断层 反思

穿行在大型商场的服装柜台,FIVE PLUS、MOVE UP、LYDS、STAM 等女装区各专柜主标识几乎都用的英文名;高校大学生坦言,欧美影视剧对他们更具有吸引力;中小學生喜欢阅读的书目中鲜有《古文观止》与唐宋诗词等传统经典……日常生活的细节仿佛在昭示着我国当今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取向——外来文化的传播大有超越传统文化之趋势。这些生活细节刺痛了我们思考的神经: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疏离?

民族文化传播,究其本质就是要解决在永远变动着的世界里如何坚定地保持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问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自殷周时代进入开创时期;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精彩纷呈,奠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根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登堂入室,形成与中国政治高度融合的儒家文化。两汉之际佛学传入,隋唐时期形成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中华民族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研究》(项目编号:GSZ12004)阶段性成果,原发表于《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年第11期。

文化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融合;北宋理学兴起,重新高扬先秦儒学。明代后期,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开始以宗教之名传播西方文化价值观。清代中期国家遭遇严重的民族危机,由此引发我国不同阶层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不自信。近百年间中西文化交流中发生的三次大的思想震荡:五四新文化运动、十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时期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造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传播断层。“民族是通过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一致性的形象和记忆加以表述的,这些形象与记忆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群体的起源、差异和特殊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具有准宗教的基础,在一个渐趋世俗化的世界里它能回答某种神正论式的问题。人民自愿为民族做出的牺牲与奉献,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从话语、想象和实践的能力来理解,这些能力支撑着一个民族体验一种超越死亡而包罗一切的意义感,或者说让个人服从一种神圣的整体性而使死亡变得具有了意义。”^①民族的话语、想象和实践能力是民族文化的显隐互溶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民族文化支撑着一个民族的个体成员服从于“神圣的整体性”,体验其中的超越性意义。这种民族精神信仰的维护,依赖于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传播体系。文化与传播兼容互渗,在很大程度上同质同构,互动胶着。因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注定要与多种文化产生碰撞与交流。不过,在一个主权国家的传播场域里,一旦这种内文化与外文化的碰撞出现本末倒置,即外来文化以一种霸权强势左右民众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感知认同,那么,文化传播所隐含的负效应就已经不再是民族文化能否构成超越个体的意义,而是危及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体系的认知态度。基于这种隐忧,反思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三个传播断层所造成的影响,就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战略意义。

一、“打倒孔家店”造成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个传播断层

世界上任何一种思想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国际与国内大环境。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方社会进入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即西方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稳定时期。“资本主义制度所需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立起了新的社会关系,它在整个19世纪稳步发展。城市化破坏了传统的社区

^① [英] 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并创造了对核心家庭的需求;工业化建立起了工作与休闲(这对概念在农村经济中有着极为不同的关联)以及家居与公共场合之间新的形式的差异;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了生产与消费、挣钱与花钱之间的新型关系。”^①资本主义工业化建立的新型社会关系,为消费文化的全球文化传播创造了适当的环境条件。因此,这一时期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在以优越身份菲薄东方社会愚昧落后的同时,也在向东方社会倾销西方文化理念与商业产品。而这时的西方信息系统所传播的中国人的形象是病态和怪异的,中国人的性格是虚伪、无耻、迷信和残暴的,中国的社会是混乱不堪,充满了饥饿、骚乱和死亡。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国内,苦于清朝腐败和战乱不断,国势衰微民不聊生的确也是社会现实。自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近代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一步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抵抗侵略屡次战败,中国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屈辱的噩梦不断的逐次累积叠加,最终摧毁了中国人的盲目自大,引发国人对封建的国家政治体制的强烈不满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省式拷问。

事实上,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政界与学界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在科技发展方面的欠缺。抵抗外侵,中国除了缺少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同时还缺少西方坚船利炮般的科学技术。至民国初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积极倡导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这种对西方文化的传播与推崇,经“留美赔款官费”等留学生的归国激情与摧枯拉朽式的五四运动相撞击,迸发为一种文化传播上的绝对化思潮。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政治助力,新文化运动也风生水起,迅速汇集成全国规模的文化革命。当时,陈独秀作为“由激进的革命小资产阶级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成为齐名五四新文化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时人并称为“陈胡”。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在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中,最集中地表现为反对孔教,“打倒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战斗内容。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中西文化对立式比较的“六义”:^②“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行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在逐项解释这“六

^① [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义”时,鼓吹“人权平等之说”。^① 胡适也在他的一篇重要的反孔文章《吴虞文录序》中,热情赞誉吴虞(当时四川省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对吴虞“推崇备至,无以复加。而根据现在所见的材料,胡适这篇文章,大约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号的最早记录。”^②胡适少时崇尚孔孟儒家,因留美期间受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再受到《新青年》同人反孔斗争的激励,终以打孔家店的战士姿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此外,李大钊、鲁迅等众多学者相继加入战斗。

反孔与尊孔,成为五四运动中新旧文化斗争的一个焦点。“孔家店”则成为这次运动用来指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定记号。“记号就是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组成的。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构成内容面。”^③用符号学的理论来解释,能指是中介物,所指则是作为这一中介物的“心理表象”或隐含意义。对于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而言,直白的革命口号决定了其词语组合的简单化并高度概括化。值得反思的是,“世界充满着记号,但是这些记号并非都是像字母、公路标志或者像军服那样简单明了:它们是极其复杂的。多数情况下我们把它们看做‘自然的’信息。一架捷克机关枪在刚果叛军中被发现:这是一则无可争辩的消息。但是,就当时想起世界各国政府使用的美国武器数量而言,它显示了一种政治选择”^④。“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意味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面对中西文化对话与碰撞时做出的一种绝对化单一文化取向的选择。也就是说,“孔家店”这一特定的中国传统文化记号被激进派作为腐朽、落后、保守、糟粕的封建社会的象征,将其一股脑搁置在中西对话的反动位置而成为新文化运动革命的对象。“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由最初列强的利炮坚船到后来西方的民主制度、技术和工业组织,巨大的冲击使中国这个社会崩溃,随之文化认同也崩溃了,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打倒孔家店;认为只有彻底打破它,才能真正地救亡图存拯救中国。”^⑤“打到孔家店”成为特定的历史大变革时期的

① 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② 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③ [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④ [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⑤ 宋元:《当代中国儒学宗教新走向——与杜维明对话》,《凤凰周刊》2004年第26期。

革命行为的鲜明标志。

站在历史反思的角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横扫一切的革命风暴具有砸碎封建禁锢、唤起民众觉醒的思想解放作用,而西方科学文化思想对中国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打倒孔家店”这一革命口号在国内广泛、持续、深入的传播,事实上造成了由学者引发并主导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的观念体系的动摇。尽管学界有研究者提出,即使当时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学者,无不是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之士。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大众传媒或是人际传播,信息接触频率和接触量均远大于普通受众的知识精英,都属于颇具权威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因此,来自于这一群体的“断言”式口号传播与大众传媒的传播功能相结合,对受众心理具有极强的影响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指称,批判孔孟之道的旧伦理旧道德,批判封建主义的“节烈”与“孝道”;与此同时,孔子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界和教育家及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也被简单化、脸谱化地放在了新文化风暴的中心任凭世人抨击鞭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孔家店”是经过当时的学者以“断言”(勒庞语)形式所提炼出来的中国社会封建政治的代名词,但“打倒孔家店”的目标所指却是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革命的迅猛异常无法顾及到其腐朽落后与优秀精华的区隔。因此,这一自精英阶层提出再经大众媒介广为传播的革命口号,既以疾风骤雨的方式摧毁了旧的文化理念,也在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同时异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的基调,从而不自觉地提供了西方文化在现代中国传播的绝对化优势地位。

二、十年“文化大革命”导致自上而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毁灭性伤害

20 世纪上半叶,历时达 10 年的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震荡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西欧和美国伤亡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新兴大国德国和日本遭受重创,英国和法国也失去了对世界格局的支配权。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成为美国的新转折点。依仗独一无二的综合实力,美国开始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主导国际秩序。尤其在被西方学者称之为“西方全球化的第二个时期”的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借助于经济快速增长与国际势力格局的大变更,一跃成为全球化进程

中的超级大国。“文化扩张既是经济扩张的结果,也是经济扩张的前提。”^①这一时期美国化的全球化进程,极其重视美国文化产品与文化价值观念的输出与渗透。但即便如此,国际社会的经济发展仍然显示出多样化的文化背景。20世纪60—70年代亚洲的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迅速崛起,引起全世界瞩目。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因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被冠之为“东亚模式”的发展模式而并称为“亚洲四小龙”。所谓“东亚模式”,指的是“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尤指儒教)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实行赶超战略,迅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②“亚洲四小龙”同属儒家文化圈,它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价值观贯通于其现代化思想体系。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日本的经济的发展也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20世纪中后期日本经济腾飞以及日本化的全球进程令西方社会陡生畏惧。1944年,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应美国政府之邀,对日本文化进行系统研究,以用来作为美国政府制定对日政策的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1946年《菊花与刀》出版后引起世界广泛关注,被认为是解析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必读书。20世纪50—70年代,日本区别于西方模式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众多西方学者惊讶的目光,他们纷纷从各个视角尤其是文化视角解读这一现象。“值得一提的民族国家是日本,有学者指出无法简单地把它放到我们设想的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当中。实际上,日本努力构建的是一种限制性的和特殊主义的现代性架构,它能够保护自己抵抗普遍主义的挑战。这也许说明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其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中,文化因素都具有长期的重要性。”^③政治传播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就是利用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来达到控制国家的政治目的。其传播功能需要根植于民族文化价值体系才能够得以实现。无论是西方文化传播对其输入国的价值取向的影响,或是儒家文化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支撑,还是日本民族文化精神对其经济崛起的决定性作用,都是属于政治范畴内的文化传播的功能实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传播是政治传播产生效果的必要途径。因此,西方国家擅长从对文化研究入手来关注国际社会,制定对外战略。

① 于沛:《对近代大国崛起的文化思考》,《北方论丛》2005年第1期。

② 张维为:《中国触动全球》,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③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国际社会经济与文化全球化大发展的 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却被无休止的国内的政治运动所拖累,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性伤害,文化价值体系支离破碎。事实上这种出于政治需要所采取的对传统文化的借喻式阉割,从 1949 年至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未中断,仅 20 世纪 50 年代就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学术文化思想的批判运动:1951 年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1954 年由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而开展的“反对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1955 年开展的“对于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均是自上而下的以新闻传媒为政治工具的大规模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党中央机关报首先发难,各地报纸、电台、通讯社继起响应,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尤其是报纸上的点名批判,严重伤害了一批同志,扩散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左’的观点,阻碍了学术文化研究的正常开展。”^①1957 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1959 年的“反右倾”斗争等,“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②1965 年 11 月 10 日《文汇报》刊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将其定性为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的“一株毒草”,文化批判很快成为政治风暴的前奏。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 20 世纪 50 年代形形色色的政治口号、政治运动和党内路线斗争的一种延续性爆发。最终,十年“文化大革命”以颠倒黑白、摧残文化、践踏人性、戕害生命而割裂了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脉络,阉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削弱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人的精神信仰缺失与社会动荡不安。

1949 年以来,我国的新闻传媒始终以政治上的宣传教育为主。关于文化传播的理念则因过于强调宏观的意识形态内容,导致其传播方式多采取空洞的口号或新八股或简单说教,这种模式化的信息传播基本上遮蔽了文化传播。十年“文化革命”更是将这种虚夸空洞的宣传推向极致。漫长的 10 年非常时期,在高度政治化的日常氛围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再次被作为一种封建意识形态的符码而遭受贬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人伦、礼仪规范、师道尊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59 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07 页。